

当代西方

国际关系

理论与实践

肖 宪 主编 杨光海 副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

主 编 肖 宪

副主编 杨光海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生森
封面设计：张继荣
责任校对：段建堂 何传玉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

肖 宪 主 编
杨光海 副主编

*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云南教育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25 字数：404千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 - 81025 - 957 - 1/D·114

定价：25.80元

前 言

相对于其它一些社会科学来说，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虽然早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就在对国家间的关系进行认识和探索，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学才从政治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学才开始进入其繁荣时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流派，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理论体系。

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先是出现在西方国家。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英美代表为了深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并探讨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一致同意在本国建立有关国际关系的研究机构。会后，两国政府相继投资成立了一批研究机构。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开设了国际关系讲座，设立了最早的国际关系学教授职位。从1919年到1926年，美国陆续有四十所大学建立了国际关系学科，一批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也陆续问世。^①但30年代末以前，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一直是在欧洲，直到二次大战后才逐渐转移到美国。

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主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和发展，经历了多次变化。早期是理想主义占主导地位；到二战前后，现实主义开始崛起，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流派；到60-70年

^① 参见邬声毅主编《当代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359页。

12/10/2007

代，行为主义又一度流行，取代了现实主义的地位；到 80 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后行为主义（或称新现实主义）、全球主义等一些新的流派。目前，随着国际体系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仍十分活跃，学派林立，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层出不穷，各种著作和刊物汗牛充栋。

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年轻学科的话，那么，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就更是处于亟待发展的“初级阶段”了。这主要是因为，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要么因战乱连绵，国力虚弱，要么受政治影响，闭关自守，学术事业发展困难，甚至屡受摧残。其结果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比起欧美等西方国家来，中国学者对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涉足至少要晚半个世纪左右，甚至前苏联的国际问题学者在这方面也要比我们早大约二十年。”^① 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交往是很不利的。邓小平同志早在 80 年代初就曾经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略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②

当然，作为后来者，中国学者也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多方面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前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迅速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也正是这样做的。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来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现在仍然还处于一个“介绍国外成果、借鉴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③ 二十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水平稳步提高，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队伍迅速壮大，充分

① 冯绍雷、潘世伟等著《国际关系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 年出版，“前言”第 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第 167 页。

③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第 11 页。

证明这样做是卓有成效的。

提高我国国际关系学研究水平的途径之一，就是有选择地翻译和介绍国外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截止至90年代中期时，我国已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著作，其中包括：威廉·奥尔森等编的《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兹格拉夫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出版）、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莫顿·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斯坦利·霍夫曼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西奥多·A·哥伦比斯等《权力与正义》（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卡尔·多伊奇的《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出版）、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山本吉宣的《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

正是通过这样一批学术著作，使中国学者认识了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缩小了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应该说，这些学术著作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些著作中，有的仅限于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有的作者过分强调某个学派的观点，还有的表述过于抽象晦涩。而且更主要的是，这些原著出版的时间都比较早，因而未能反映当代国际关系中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因此，要保持对国际学术界的了解，就必须经常不断地、全面地

翻译介绍一些国外最新的学术成果。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关系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现象，如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上升、高科技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加大、区域化和集团化的发展、民族和宗教势力的崛起、国际关系中的人权问题以及恐怖主义，等等。西方学者是如何来研究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的？他们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和理论？西方各国对新的形势作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在战略上作出了哪些调整？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心和了解的问题。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选编了这本《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与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相比，这本书有三点显著的不同：一、它不是由一、两个学者撰写的专著，而是收集了三十多位西方学者的学术成果。这些学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有所建树，都是当前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二、这本书的内容既包括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也涉及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许多具体问题，介绍了一些国家和组织的政策和行为。三、这本书中所讨论问题的时间下限是90年代初，因此，从书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出，一些当前学术界所关注的新现象和新问题都在讨论之列。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的各专题文章选译自不同的西方出版物，加上在成书时我们在文字和结构上又进行了必要的加工处理，所以我们称本书采用的是“编写”的方式。然而实际上，书中的各篇文章从内容、形式到语言仍然是西方学者的成果，基本上都保持着“原汁原味”。

应该注意的是，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国际关系学也是一门涉及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学科。我们介绍这些西方学者的学术成果，并不等于我们就赞同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事实上，我们发现某些西方学者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看法是非常主观和片面的，他

们的一些结论也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吸收他们成果中有益内容的同时，还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性的眼光，而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这本《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书中的错误和问题在所难免，因此，我们也诚挚地欢迎国内学术同行提出批评。

肖 宪

一九九八年二月于昆明

目 录

前 言	(1)
1. 国际政治理论	(1)
2. 文明冲突论	(20)
3. 国际机制	(35)
4. 国际法	(50)
5. 国际同盟	(59)
6. 民族主义	(84)
7. 帝国主义	(100)
8. 外 交	(117)
9. 革 命	(130)
10. 战 争	(144)
11. 人 权	(157)
12. 民主化	(178)
13. 难民问题	(196)
14. 恐怖主义	(211)
15. 军控与裁军	(232)
16. 核扩散	(250)
17. 有限资源与国际关系	(264)
18. 国际贸易与新贸易保护主义	(284)

19. 联合国	(298)
20. 国际法院和其它国际性法庭	(313)
21. 世界银行	(328)
2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42)
23. 跨国组织和跨国公司	(362)
24. 区域政治组织	(378)
25. 区域经济组织	(402)
26. 区域文化组织	(418)
27. 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关系	(430)
28. 欧洲一体化	(449)
29. 中东问题	(468)
30. 亚洲问题	(490)
后 记	(505)

1. 国际政治理论

理论是一种论辩形式。这种论辩旨在从已经发生的事物中辨明有重大意义的内涵，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知识。人类由于具有认知本能，所以能够凭借自我意识完成这一过程。而凭借自我意识创建理论，就是以尽可能严谨的态度发挥认知本能。从历史上看，政治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构筑理论和阐释理论的方法。其中一种是以政治哲学的结论看待理论。此况下，理论被视为实践的指南，凡是有助于实践的理论就被认为“有指导意义”。根据这种方法，构筑理论就是从历史事件的记载中提取材料，思考并揭示其内在规律，以使实践者知道将如何去顺应和改造历史。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大多数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都在致力于探索这种“切合实际”的理论。

随着科学革命的发展，社会科学对人们关于世界政治的认识的影响日益增强，其影响也包括了古典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以其实证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并受若干规律所支配，这些规律不仅能够被人们认识，而且人们必须遵循，否则便会失败。这一学派虽然受科学研究方法的制约，但仍然在把经验主义变成指导实践的方法论的尝试中作出了努力。随着政治领域具有挑战性的行为主义学派的出现，经验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离：前者仅限于对事物进行描述和解释，经不起科学的检验；后者虽竭力自保，却由于缺乏方法论而有失严谨。于是，世界政治中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便应运而生。

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所谓科学理论都具有两层含义。就第一层含义而言，它是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旨在解释行为的命题和主张”。根据这一含义，一项理论既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错误的，而且我们无法得知某个正在形成中的理论与业已得到验证和被接受的理论之间有何区别。科学理论的第二层含义较为狭窄，它仅指经过系统排列的一套知识体系。这样的理论试图筛选出一些经过检验并得到接受的命题和主张，来对一系列根据大量材料所形成的概念进行解释。这类理论只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尚未见之于国际关系研究中。虽然说在这方面已出现了建立这类理论的现象，但更确切地说，它仅仅是目标而已。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从认识上提出某些假设，并将某些实际做法以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其能够指导我们的活动。

一、现实主义的统治地位

通过用科学实践理论的评判标准，可获得一种对世界政治理论的一般认识。在西方，现实主义学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就一直支配着世界政治理论的研究，战前则是理想主义居于统治地位。理想主义学派虽然曾一度确立了以凡尔赛和约及国际联盟为支柱的世界秩序，但由于未能维持世界和平，阻止新战争的爆发而被现实主义所取代。现实主义学派及其权力政治理论源于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人的学说以及普鲁士的“现实政治”理论，它的宗旨在于揭示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规律。汉斯·摩根索（1948年）对现实主义学说作出了最为恰当的表述和最为全面的概括。他的研究成果是国际政治理论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过程中唯一的和最重要的依据。不仅如此，他的著作还被奉为现实主义的经典。

为了解释为什么理想主义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摩根索试图揭示那些被理想主义者所忽略的、能够制约危机的现实主义行为法则。在他看来，一切政治都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各国都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己任；一国的权力能够通过另一国的权力而得到最有效的制约。在阐述这些一般“法则”的过程中，摩根索还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并对在开始研究之前必须首先解决的主要问题作出了回答。这些问题包括：世界是由哪些基本力量组成的？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应该用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回答这些问题？等等。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范例，其中所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石。

摩根索对当时那些最紧迫的政治问题所作出的回答，构成了一套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成分的、切实可行的理论。这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观点，其中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内容：

1. 民族国家或他们的决策者是研究国际关系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行为体。

2.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3. 国际关系是谋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本学科的目的就在于，揭示这种斗争如何产生以及为什么会产生，并且提出调节这种斗争的方式方法。

上述论点为本学科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提供了指南，并作为一种制约因素，使学者和政治家明白他们的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

摩根索提供的答案虽然很多，但并非无所不包。在摩根索取得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之后，各派学者在建立“大理论”方面的尝试日益减少，而是更多地研究那些被摩根索以及早期现实主义者称之为正统领域中的狭义性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一趋势虽然被不同的学术流派搅得混浊难辨，但仍然可以被看作是在阐发现实主义的观点，并且力图使之更加详尽和准确。现实

主义学派对国际政治研究的一大贡献在于，它为该领域提供了一项普通的研究日程，并使研究工作得以持续下去。现实主义学派当中有多种理论（或理论雏型），其中有些与摩根索创立的权力政治学说比较接近，而大部分却与此尚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只要不违背现实主义上述三个基本论点的任何一条，所有这些理论均可以归入这一学派。

一项理论是否合理可行，有不同的判定标准。现实主义学派，尤其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优越性就在于，它是以“有效—无效”以及“是否适用”为标准的。该学派宣称，在理想主义失效时，它能够取其而代之并发挥效用。现实主义具有的强大的解释能力可以在摩根索运用国家利益这一概念解释国家对外政策中得到体现。正如他所指出的，国家利益概念使人们能够置身于决策者的位置，并且跟踪和预测他们的活动。民族国家是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行事的，由于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所以国家采取的任何一种对外政策行为都可以有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这一经过高度概括的见解使得国家的掌权者，尤其是像美国那样历史相对较短、治国经验欠缺的国家的掌权者，能够找到权宜之策，并在茫然莫测的世界事务中把握自己国家的对外政策。

国家利益这一概念，还为实施（和评价）对外政策提供了一个标准。现实主义者们断言，对外政策应该由专家来制定，这样对外政策才能达到理性化。摩根索不仅为解释对外政策和预测其他国家的行为提供了一种方法，而且还提供了一种用于指导实践的世界观。现实主义为评估代价与收益以及政策成功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它既有很强的解释和概括能力，又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实用性。这与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欧洲尤其如此，因为这一地区权力政治有悠久的传统。

在学术方面，现实主义通过吸收其他学术领域的精华使之与自己的三个基本论点相符合的方式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发展。这说

明它是一种能够用于指导研究的行之有效的理论。现实主义关于核威慑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论述，既丰富了它自身研究的内容，也使它能够经得起当代重大事变的考验。有些学者认为是华尔兹将现实主义理论推向高峰。他通过创立新现实主义学说对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严谨的和极有说服力的理论。如果将华尔兹的理论同吉尔平关于战争与和平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以及基欧汉关于霸权主义及其机制的理论结合起来，我们就有希望建立起一种理论范式。

这一结论可能会在美国得到广泛接受。然而，它的效力与其说可以用来解释对外行为和指导对外决策，不如说可以用来指导人们的思维。在过去的十年中，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论点已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和准确性了。在国际政治领域，最严格的实证研究一直对这些论点提出疑问。如果有人要坚持现实主义理论，他就必须不断地提出新的论据。冷战结束后，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的要求已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有必要重新建立一套国际政治理论，而且这一理论只有在广泛吸收多学科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具有科学性和适用性。也只有这样，现实主义在解释对外政策和国家行为中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及其三个基本论点的不足之处才有可能显露出来。

二、对外政策和理性行为体模式

现实主义理论在研究国际政治时，一个最为薄弱之处在于国家利益概念方面。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所有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是相同的。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是关乎国家生存的根本问题。不过，摩根索（1952年）认为国家利益除了这些最根本的需要外，还应包括逻辑上与这些目标相适应的一切行为。然而，这就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即国家利益中的可变性因素会淹没那些

根本的因素，从而最终导致一切问题都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披上正当合法的外衣。作为一个美国人，摩根索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显然在于美国应该采取国际主义，而不应采取狭隘的孤立主义。但他同时又认为，美国的国际主义也不能走得太远，以致于丢弃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去谋求类似于联合国的超国家主义的利益。

尽管摩根索和美国的现实主义并不赞成本国政府对发动朝鲜战争所作的辩解，但他们在避免以上两种危险方面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然而，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概念是建立在一种很模糊的思维基础之上的。沃尔弗斯（1952年）在一篇有先见的文章里指出了这里面的不少缺陷。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国家所力争的不只是安全方面的利益，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也不仅仅是生存，而且是要更好地生存。当然，对于细心的观察者来说，他们并不对此感到惊异，因为在以下两种情况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一方面，根据现实主义“法则”，民族国家是依据由实力决定的利益来行事的；另一方面，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并非总是能够实现它们的国家利益，而后者正是受到摩根索、凯南及其他现实主义者的尖锐批评。

这种批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国家利益中的可变性因素实际上在不断地侵蚀着那些最根本的因素，最终导致国家的任何一种行为都会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变得合法化。沃尔弗斯曾经告诫说，国家安全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它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分析研究方面，而在于决策者可以借此为他们想要采取的任何一种行动进行辩护。早在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爆发之前，这位学者就已预测到了将要用国家安全这个概念证明的各种各样的行动。

国家安全概念的模糊性还在于，它不能被用来“有效”地指导国家的对外决策。它无助于决策者在特定的条件下确定本国的

国家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他们选择行动方案提供指导，也不可能对如何实现国家利益的目标提供任何帮助。另外，尽管借助这一概念能够对发生过的行为作出解释，但这样的解释往往具有主观臆测性。因此，假若依据这个概念来预测未来事态的变化，决策者势必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其结果将是事实与主观愿望相背离，即所谓的“智能失灵”。总之，依据国家安全这一概念所得出的解释尽管会娓娓动听，但却是不准确的。如果把它用来指导对外决策，则将是“不充分”的。虽然说大多数学者已经不再把它用作分析国家对外决策及行为的手段，但它仍然在实践中被人们引用。这是因为迄今还没有另外的哪一种概念能够单独作为评价和实施对外政策的标准。

随着国家利益作为解释手段所暴露出的问题日益明显，早期的行为主义者便试图寻求新的解释方式以弥补古典现实主义之不足。斯奈德、布鲁克和萨潘这三位学者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式，以期找到影响对外决策的各种因素。他们试图创立一套能够用于解释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的理论。为此，他们遵循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使研究领域从以往那种通过考察各国的历史发展来解释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做法中摆脱出来。同时斯奈德等人还解决了早期现实主义理论中所存在的将民族国家人格化的问题。他们将关注点放在决策者以及能够对决策者产生影响的那些人方面，这使得国家这一概念具有可见性和可操作性。不过，斯奈德等人建立的理论模式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强调任何事物都与其它事物相联系；另一方面却未能分辨和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在这方面作出了主要贡献的是罗斯诺（1966年），在他的推动下，学术界兴起了对外交政策进行比较研究的热潮，旨在建立一套统一的、科学的对外政策理论。然而，在取得了一些初期的成果之后，这方面的研究一度陷入困境。这主要是由于学者们无法就研究资料的可靠性问题达成一致，另外也因为没有取得进一步的成果而使学